

## 梅家老爹：一辈子的鞋匠



▲梅位炳虽90岁高龄，但仍坚持每天做鞋子。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家鞋铺销售，以补贴家用。“有位残疾人，帮我们家做鞋十多年了，现在腿脚更不方便了，就让别人帮他吧鞋送到店里来，一周一次。你说，这样的鞋，我们能贱卖吗？”梅位炳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些送到店里的鞋上植子，将鞋面撑开。“不讨价还价”的店规，就是他给定的。

老顾客徐福美来了，直接买了4双。“他们的鞋价廉物美。我买的款式，只要80元。这样的鞋，在南京市里要卖100多，在北京要200多。”不仅徐福美自己家喜欢穿手工布鞋，她外地的朋友，也经常让她从梅家鞋铺代购。“说良心话，他们的鞋，多少年没上调价格了。”

“根据成本，我们稍微调了些价格。”同在店里做鞋的梅家女婿周福头，做了30多年鞋，他眯缝着眼睛笑着解释说。他说的调价时段，跨度有30年。

说句话，90岁高龄的梅位炳拎着布袋优哉游哉来到店里，脚上奇怪地穿着胶鞋。一进店门，他就忙着将胶鞋换成布鞋，打水洗脸洗手，泡茶以及整理各种做鞋的工具，间或和子女女婿嘀咕几句。

身板硬硬的梅位炳至今只和老太居住，刚才在家忙着洗纱窗，还和老太发生了点小争执。“有些活我能干，不要她帮忙的。”老人嘟囔着，手中动作却干净利落，一点不像是90岁

高龄的人。

### “一步不到，一处不行”

“做鞋不晓得累，换个行当就很累，主要是习惯了。”老人并不急着就座工位，而是像练书法的大师一样，要将各种工具整理完毕，直到眼前不再有任何繁杂，才真正进入挥毫状态。他坐的那把小竹椅，已经陪伴了他多年。

“学这门手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梅位炳从小就在高淳老街上，从事手工制鞋70多年。

9岁那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梅家为躲避战乱，都搬到乡下表姐夫家去了，在那里一直读书到13岁。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跟表姐夫学做布鞋。3年学徒之后，又在表姐夫家做了一年帮工。

抗战胜利后，看到镇上的人陆续回迁，他们全家也回到淳溪镇，重建房子后就开始在老街摆摊。

以往每到过年，人们都会请裁缝给做新衣，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则拿到鞋铺加工成鞋。年前两三个月，总是梅位炳最忙的时候，晚上要做到十一点，早上三四点钟就得爬起来。常常做着做着就睡着了，醒过来再继续忙。就这样含辛茹苦，他凭着自己的手艺，拉扯大四个子女。

后来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没什么人请裁缝回家做衣服了，梅家也没有边角料来做鞋子了，但到店里买鞋的人却越来越多。从那时候起，鞋铺开始做成成品布鞋。

梅位炳做的鞋，基本沿袭了传统布鞋制作工艺，现在除了做鞋帮用缝纫机外，其他工序都是靠手工完成。

做好的鞋也一定要上鞋楦撑鞋面，用老人的话说，这是“一步不到，一处不行。”他拿出两只同样的老虎鞋，撑过的鞋显得饱满，没撑过的则显得干瘪。“不用鞋楦撑鞋，就会挤压小孩子的脚，穿着就不舒服。”

青奥会武术比赛期间，地方政府决定将老人的手工布鞋，当成礼物赠送给远道而来尊贵客人。

### 梅家老爹的心思

以前，梅位炳只埋头做鞋不愿和别人交流；如今接受采访多了，他普通话都能说不少了。话匣子一打开，梅位炳就收不住了。

“来我店里的人很多，很多人与我合影留念。”老人从身旁的柜子里抽出两本相册。“他们每次再来时，会给我带来这些合影。我就把照片一张张存放起来。”

老人的存在，成了很多都市人的乡愁。来自香港的何美珍，2007年造访高淳老街，专门买了一双手工蓝色布鞋，爱不释手，事后专门写信感谢“梅爷爷”，并寄来她与梅位炳的合影。如今，这封信与照片，就收藏在梅位炳的相册中。

这些年，老人自豪的是，他通过手艺，拉扯大了4个子女，至今生活都不错。

“大孙子在漆桥镇政府上班，二孙子在银行上班，都不学手艺了。这门手艺，没法再传承，他们连针线都没拿过。”

“您现在生活自在舒适，为什么还要坚持每天来做鞋呢？”

对于记者的提问，老人愣了一下。“现在和我同龄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的不在了，有的躺在家里出不了门。在公园里的老人，都是我的后辈，我都不认识，聊也聊不到一起去，没有共同话语，还不如在店里忙着。”老人停顿了一下，“这些年，政府很重视我，为我做了很多宣传，我已经成了高淳老街的招牌了。政府这么重视，我也不好意思停下来。我在店里，老街这块招牌就在，我也挺开心的。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店里做鞋，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空跑一趟。”

他又“炫耀”地拿出20厘米长的“铁压子”，“这是刚做给我的，少说也有100年了。”

“铁压子”是用来压鞋边的，经年累月，被老人的双手磨得锃亮铮亮。

“现在有多少传统的手工艺没人传承了？箍桶的没人了，篾匠也没了。没这个市场，社会也没这个需要了……”

老人陷入一种近乎自言自语式的唠叨。

“在病房的入口，有一个用很多接受过手术患儿照片拼出的心形图案，有的孩子在表演乐器、有的在体育活动……除了需要终身服药，他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学习，是供者的爱和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给了这些孩子第二次生命

## 「黄孩子」变回了粉嫩娃娃

全国最大儿童肝移植病区采访记

本报记者仇逸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外科大楼三楼两间相邻的手术室内，记者看到28岁的潘颖和4个月的女儿豆豆分别躺在手术台上，共同渡过人生中重要的关卡。

透过11公分左右的腹腔切口，母亲潘颖的肝脏左外叶被切下，灌注后，迅速转移到隔壁的手术室内，在那里，豆豆的病肝除了几根血管相连，已经基本处于悬空游离状态，等待着母亲肝脏的植入替换。

和母亲粉红色的肝脏不同，豆豆的肝脏是绿褐色的，硬得几乎接近石头一般。空气中，只听得仪器的嘀嗒声，还有抽吸血液、轻轻的手术钳子的敲击声。

豆豆的体重不到5公斤，腹腔更狭小，主刀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肝脏外科主任夏强的手显得格外稳定、灵巧，对供肝进行进一步的修剪后，180克的肝脏被放入了豆豆的胸腔，细如发丝的一根根血管和胆管高质量地重建，确保植入肝脏存活。

此时，从8点45分开始的供体手术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11点，母亲的手术基本结束，而从上午9点半直到下午3点，豆豆的手术才顺利完成，整套手术仅输血100毫升。当天下午，潘颖苏醒过来转移到普通病房，而次日，豆豆也脱离呼吸机，她将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精心护理，迎接抗排斥、感染等挑战。

记者在肝脏外科儿童病区见到了豆豆的父亲桂磊峰。“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就希望她能健康长大，也希望孩子妈妈能早日康复。”豆豆一家来自江西，今年2月出生之后，豆豆就出现了黄疸不退，整晚哭闹，两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为胆道闭锁，加入了一个病友QQ群后，桂磊峰知道了有许多同样遭遇的家庭，选择来到上海治疗。

今年5月起，豆豆留在上海“长体重”以提升手术的成功率，然而由于胆红素升高等因素，体重不升反降，医生决定把她收治入院4日进行手术。“我们经历了伦理审核，医生也在谈话中告知了风险等各种事项；不过我们一直有信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帮到我们。”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里的患儿非常容易辨认，等待手术的孩子通常是黄黄的，而术后康复的孩子，特别是随访的孩子则褪去了黄色，很多变得雪白粉嫩。

一间病房内，术后15天的宣宣衔着奶嘴熟睡，这个7个半月大的可爱女婴不时撅着小嘴，在她边上半躺着捐出部分肝脏的母亲孙小伟。“孩子好了，我们这个家就好了，感谢医生。”

在病房的入口，有一个用很多接受过手术患儿照片拼出的心形图案，有的孩子在表演乐器、有的在体育活动……除了需要终身服药，他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学习，是供者的爱和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给了这些孩子第二次生命。

全国每年新发胆道闭锁患儿在3000例左右，其中80%的患儿生下来后因为肝衰竭存活不过1岁，除了胆道闭锁，一些遗传代谢病的孩子也需要儿童肝移植。

看着失去孩子家庭的绝望和痛苦，2006年初，夏强带着团队开始转型，开拓儿童活体肝移植这一艰苦的医学领域。他带领团队去实训基地做动物实验，每天14个小时的训练，活体移植最大的难点是在于肝脏血流完全开放的状态下，确保离断手术不出血，但是肝脏又是一个血管密集的器官，往往肝还没有完成分离，实验小猪已经大出血死亡。儿童肝移植还需要吻合口径仅1到2毫米的血管，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儿童活体肝移植技术真的太难了，夏强一度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但是他没有放弃，咬牙坚持训练了整整10个月，把每一个分离的动作反复磨炼，并提出了“精准切肝”的超前理念。

如今，夏强带领医院肝脏外科已经连续7年实现肝移植手术量全国第一；他们创立了国内首个儿童肝移植病区；创建了国内最早、也是最大的儿童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牵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器官移植学术组织，精湛的技术，吸引了国内外的患者，例如从2014年到2018年，团队为来自马来西亚的20多名终末期肝病患儿成功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

这里的医生们白天开普通手术，晚上做肝移植，经常连续四五天不回家；病人只要有问题，24小时可以拨打电话；护士发烧后仍然坚守岗位，一只手打点滴，另一只手给患者写护理记录。记者在手术室内看到，工作到凌晨的医生坐着趴在蓝色布包上打瞌睡，休息后继续工作。科室儿童肝移植数量累计已经超过1300多例；其中仅2017年完成儿童肝移植442例，占全国总数的68%。

“我们不刻意追求第一，作为医生，自己的努力，挽救一个个孩子的生命，分享一个个家庭完整的喜悦，就是最大的回报。”夏强说。

## 作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2015年10月，陶然到北京看望杨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论，但如果问我的话，即使烧成灰我也热爱文学。”

大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当时很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成了“禁书”，想找到一本名著非常难。一个偶然的机会，陶然得到了一张琉璃厂中国书店的购书卡，令他意外地获得了进入“书库”的通行证，接触到大量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梅里美的《卡门》、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这些著作不仅大大开阔了陶然的文学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奠定了基础。

### 香港情怀

1973年9月，陶然到香港投奔姐姐。那个年代香港的经济状况差，很难找到工作。这让初到香港的陶然感到悲哀和受挫。

在最彷徨的时刻，是文学重新燃起了他生活的希望。1974年，陶然的处女作、短篇小

主，涵盖小说、散文、笔记、文论等文体。此外，发表的文章涵盖四大洲21个地区的华文作家创作的作品。

今年1月，《香港文学》走过33年的历程，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文学月刊。在该刊今年第一期的“卷首漫笔”中，除了表达对文学的坚守外，陶然还表示，杂志决定将维持17年不变的稿酬提高一倍，以“回报作者绞尽脑汁的辛苦于万一”。他深知“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是清苦而又寂寞的”。

### 文坛佳话

香港鲷鱼涌，一座写字楼的顶层，《香港文学》的编辑部就设在这里。在陶然的办公室里，跟他一起翻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老照片：北京、香港、巴黎；与艾青、与杨绛、与莫言；60年代、80年代、新世纪……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就这样相伴而行，也成就了不少文坛佳话。

翻到一张陶然与著名作家杨绛在2015年的合影时，陶然回忆说，因为与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钱媛是北师大校友，并有通信往来，自2004年起他每年都会到北京探望杨绛。最后一次是2015年10月，那时杨绛精神尚好，能抄写钱钟书的诗词。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京去世。当年8月号的《香港文学》特别推出“杨绛纪念专辑”。

1988年，31位香港作家发起成立香港作家协会（1992年改名为香港作家协会），首任会长是曾敏之，刘以鬯为名誉会长。2009年，潘耀明、陶然被选为会长和执行会长，并一直连任至今。自2001年起，陶然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内地众多文学刊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作家肖复兴曾说，陶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样性情的人，怀旧之情，便常会如风吹落花，飘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拥有一支这样静穆情深之笔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样的笔下，岁月陶然，心亦陶然”。

陶然办公室的窗外，是一座天台花园。他静静地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那一刻，时光如静水深流，眼前与过往的一切，亦近亦远。

新华社香港7月15日

“文学是陶然人生行旅的背景和底色，他自称‘东南西北人’，一生以印尼万隆、北京和香港为三个主要的人生驿站，他的人生画卷和文学旅程也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

新华社记者闾捷

言语不多，声音不高，不紧不慢，但感觉敏锐而细腻，思维缜密而深刻，对文学的深情与韧劲，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作家陶然。

坚持文学创作44年、执掌《香港文学》18年，他曾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诗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深情：“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第十二届香港文化节正在香港举行。陶然作为文学研讨会“文学行旅的流转人生”的讲评人，近日出现在中央图书馆演讲厅的讲台上。他在讲评“旅行与文学”时表示，生活经验比文笔更重要，因为文笔可以磨练，而生活带给人的智慧是很难得的。

文学是陶然人生行旅的背景和底色，他自称“东南西北人”，一生以印尼万隆、北京和香港为三个主要的人生驿站，他的人生画卷和文学旅程也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

### 文学情结

原名涂乃贤的陶然，少年时代在印尼的万隆度过，上世纪60年代被父母送到北京读中学。1964年，陶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而他的“文学梦”始于当代著名诗人蔡其新。

因为同是印尼归侨的缘故，年轻时代的陶然深受蔡其新的影响。他至今仍记得蔡其新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即使社会上流行文学无用